

中美军事透明度问题的新安全观思考

——兼与马伟宁 (Brendan S Mulvaney)先生商榷

李义虎 (北京大学国际和平与安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教授)

赵为民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内容提要] 仅仅以现实主义逻辑看待中美军事透明度问题,容易得出安全困境难以缓解的结论,进而失去认识该问题的必要前提,因而存在着很大局限性。从新安全观出发,积极寻求和构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制度,才能找到安全困境的有效解决途径,也才能为解决军事透明度问题(包括能力透明和意图透明的关系)提供必要前提。树立新安全观、加强中美军事交流与合作、建立双边制度化保证的军事信任措施,是切实解决双方军事透明度问题分歧的具体途径。

[关键词] 中国 美国 军事透明度 安全困境 新安全观

军事透明度是中美关系中复杂和敏感的话题,也是反映两国利益汇合点大小的晴雨表。如果仅仅以现实主义逻辑来考察中美军事透明度问题,且片面强调能力透明在双边军事关系中的重要性,就很难全面和深刻洞察该问题的实质意义。本文认为,中美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关键责任的两个特殊大国,只有采取新安全观对待军事透明度问题,才会增强两国对国际安全形势的共有观念,消除在军事合作与交流中的误解、疑虑和不信任;只有积极寻求和构建新安全制度,才能加强双方在军事领域合作的制度性基础。

一

就国家间的博弈行为来讲,“透明”一词带有复杂的含义。在当今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国际社会日益成为相互依赖的整体的情况下,完全不透明是不可能的;同时,完全透明也是很难做到的,否则谈何外交策略和艺术?任何国家,包括中美两国,在军事透明度问题上,都力求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是,正如扑克牌游戏,双方通常都不可能彻底摊牌,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知己知彼”。连《中美

军事关系中的透明度问题》一文(以下简称《透明度》)也承认,公众要想得到关于美国军队的最敏感信息是不容易的。^①实际上,所谓透明度之所以成为“问题”,取决于国家间博弈的两种性质。(1)动态性,国家间博弈是一种动态博弈而非静态博弈。由于博弈行为是否透明只能在大于0而小于1这个闭区间动态变化,所以才有透明的“度”的问题。(2)持续性,国家间博弈是持续多次而非一次的博弈。国家间只有进行持续性的博弈,透明度才有衡量的必要,因而被赋予实际意义。如果国家间只进行一次博弈,透明度不仅没有实际意义,相反欺诈占优倒可能成为国家的一种“理性”选择。就此而言,军事意图透明度是指国家按照持续博弈而形成的军事规则和惯例,将其军事战略、策略、艺术、方针等意图向外界公开的广度和深度。军事能力透明度是指国家按照持续博弈而形成的军事规则和惯例,将其军事实力等基本状况公之于世的程度。当然,这里所说的“军事实力”与“军事能力”是两个相互联系但又有所区隔的概念。军事实力包括国防经费、国

^① 马伟宁:“中美军事关系中的透明度问题”,《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0期第60页。

防工业、国防资产、兵役制度、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等；军事能力则除此以外还包括军事领导、管理效益以及国家对军事损伤率的承受力等。军事实力因有能够量化的公开指标可进行直接衡量，其透明度一般容易辨识；而军事能力则因取决于相关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只能进行间接衡量，其透明度一般仍较难辨识，甚至存在着“条件性隐形蔽障”。

从博弈论来看，中美如何对待军事透明度问题，包括如何对待能力透明和意图透明的关系，可以归结为安全困境问题。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解释安全困境、特别是解释安全困境的结果时，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与现实主义逻辑有着重大不同，这也影响到二者对中美军事透明度问题的看法。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相互猜疑，竞相以自助方式追求绝对安全，由此导致军费扩张和军备竞赛螺旋升级，谁都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安全，相反在安全问题上共同陷入了某种恶性循环。也就是说，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的必然产物，所有国家都无法逃脱。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和沃尔兹（Kenneth Waltz）虽然提出过均势方案，但认为在现实中安全困境很难缓解。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持有悲观的看法，它强调安全困境易于引发冲突而排斥合作。在中美军事透明度问题上，中美安全博弈中的不和谐因素自然使一些人更倾向于采取现实主义的观点，《透明度》一文正是以此来理解中美对待国际制度^①的态度以及两国军事透明度问题的，并经验地认为，美国愿意通过国际制度处理安全问题，中国仅根据自身利益对待国际制度；美国在军事事务中追求较高的透明度，中国对透明度的不平衡结果比较敏感。其结论强调中国应该提高军事透明度，尤其是军事能力透明度，并认为军事交流与合作可以避免双方不必要的冲突。^②

本文认为，仅仅以现实主义解释军事透明度问题带有一定局限性。因为如果按照它的逻辑认定安全困境很难缓解，^③那么谈论所谓军事透明度问题，特别是中美这样大国的军事透明度问题，很可能是无解的。因此，问题的症结是如何促使安全困境缓解，以使军事透明度问题的解决具备必要的前提和条件。在这方面，中国所提倡的新安全观超越了现

实主义逻辑，以它为指导所构建的新安全制度不失为缓解安全困境的一条有效途径。其理由在于：（1）新安全观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就是否定了现实主义关于安全困境持久性的观点。与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安全利益相互排斥的观点不同，它强调在安全问题上通过诱发共同利益，本国利益、他国利益和国际社会利益可以达到多维性统一；与现实主义关于国家间充满猜疑的观点不同，它强调通过在安全问题上积累和强化共有知识和共有观念，国家间可以建立和培植相互信任；同时，与现实主义有关安全竞争中的零和冲突逻辑不同，它强调相互依赖持续博弈过程中安全合作的双赢和共赢结果。如果各国能够达到利益共融和互信互利，那么它们不仅能够以共同努力促使安全困境的缓解，而且能够展开彼此的安全合作。（2）新安全制度是基于共同利益所建构的为国际社会所公认和共同遵守的综合安全系统，可以给安全合作提供制度性保障。新安全制度与集团政治和军事联盟等传统制度形式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重大不同：一是后者容易诱发安全困境，而前者以促使安全困境缓解从而建立安全合作和达成共同安全为基本目的；二是后者具有单边性质，而前者是在解决安全问题时构建的、各国公认和共同接受的多边安排；三是后者要求按照盟主的规则和标准办事，而前者要求按照共同规则和标准办事。由于新安全制度具有以上三个重要特征，所以当它更好地发挥作用时，安全困境的土壤得以削弱，国家间的安全合作成为现实选择。

由上面可以看出，新安全观和新安全制度突破了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传统安全模式，在促使安全困境缓解的基础上为合理解决军事透明度问题找到了一条现实的途径。特别是，新安全制度的主要作用在于它可以削弱和消除安全困境的结构，这样就为解决军事透明度问题提供了最重要保证。因此，

^① 此处采取基欧汉对国际制度的广义定义，即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也属于国际制度。

^② 马伟宁：“中美军事关系中的透明度问题”，《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0期第62页。

^③ “中美军事关系中的透明度问题”一文虽然使用了现实主义的逻辑，但没有涉及安全困境问题。

大国间要想增加军事透明度,必须以安全困境缓解为前提,必须认知到需要采取共同努力,例如建立新安全制度来达到这样的目的,而不能简单和孤立地谈论透明度问题。在这方面,有关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裁军的制度,包括军事领域的相互信任措施,是解决军事透明度问题的制度性和体制性基础。只有大家都共同遵守这些制度,才会有可以预见的国际安全环境,同时也才会有可以衡量的国际标准。在相反的情况下,如果一味强调军事透明度,则可能成为单方面的要求,也可能成为强者对弱者的一种施压借口。因此,军事透明度应该植根于新安全制度,其标准应该以大家共同认可和接受为依据,而不是单方面或片面的设定,也不应该在执行的时候奉行双重标准。换言之,只有存在新安全制度,而且有关各方都表示接受它们,才会有军事透明度方面信息资源共享的机会。中国认为,中美作为两个对世界事务负有责任的大国,应该通过促使安全困境的缓解,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为此它们应该付出相应的实际努力。同时,中美两国还需要建构双边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合作的制度安排,确立共同认可的制度规则和标准。中国希望中美在战略领域和军事领域保持对话和合作的势头,实际上是希望中美军事合作的基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和机制化。中国领导人所强调的对美政策精神,即“增加信任,减少麻烦,不搞对抗,发展合作”,有助于加强双方关系的制度建设,包括军事领域关系的制度建设。只有在中美加强军事交流与合作,特别是使之具备制度化保障时,才能提升双方军事关系中的信任度,也才能使军事透明度问题具有解决的基础。这是理解中美军事透明度问题的一个重要背景。

在这里,需要解释中国如何对待国际制度的问题。以新安全制度来考察,不能说中国不重视国际制度,虽然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并不忽视权力的作用,这似乎符合现实主义的逻辑,但它所提倡的新安全制度恰恰超越了现实主义的逻辑。历史地看,中国对国际制度的偏好越来越强,中国认为正义的国际制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例如,自1949年以来中国就十分重视国际法的作用,而我们知道,国际法在广义上也是一种国际制度,且是最稳定、最成熟和最系

统的国际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出发,更为积极地融入国际体系,参加了大量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其中,既包括多边的,也包括双边的;既包括国际社会共同创制的,也包括美国带头创制的;既包括WTO那样的国际经济领域的制度,也包括有关限制核武器、防止核扩散和其他军备控制与裁军等领域的制度。迄今为止,中国的国际制度参与度已经达到美国的70%多。在安全制度方面,中国近年来的参与度也有大幅提升,例如,它已经参加了12个国际反恐条约中的10个,签署了1个;它是东盟地区论坛(ARF)、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东北亚合作对话会(NEACD)等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进程的参与者;它还努力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参与国际制度、包括新型安全制度方面,中国是表现得最积极的国家之一。中国虽然认为现存国际秩序,包括军事秩序有不合理之处,但没有推翻这一秩序的意图。相反,中国主张积极地融入和参与,这样做意味着它愿意接受和遵守相关规则和标准,目的是与其他国家进行更富有成效和更持久的安全合作。应该说,中国所展现出的建设性和负责任大国的态度,仅仅靠现实主义的逻辑是无法解释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虽然在战后大部分时间里重视国际制度,但在后冷战时期却漠视或抛弃了某些国际制度。例如,美国相继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和《京都议定书》其NMD计划甚至突破了国际军控制度。按照法治发展的成熟程度来讲,美国更应该带头遵守国际制度,但其救世主观念和实用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其所作所为挑战了国际制度的权威。毋宁说,中国现在乐于接受大多数国际制度的原因,可能正是美国不愿接受某些国际制度束缚的原因。

二

《透明度》一文认为信息不透明是世界局势不稳定和威胁国家安全的一个原因,因而需要解决军事透明度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同意这个观点,但认为应该更明确地解决信息沟通困难和由此带来的有效预期不足问题。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问

题,国家间在军事透明度问题上相互猜疑和相互敏感,常常以互不信任的方式理解对方的意图和能力以及由此导致的行为,而这恰恰是军事领域合作的主要障碍之一。所谓信息沟通困难包含两种情形:一是获取信息的自然难度。在一个充满变数的环境中,多数国家都很难直接掌握完整和充足的信息;二是受限于技术和社会条件。不同国家对透明度的理解是不同的,所采取的行为也是不同的,因此会产生信息沟通中的不对称现象。就此,现实主义强调,在世界存在不完善信息和沟通困难、因而也不可能真正解决透明度的情况下,国家只能注重能力透明的重要性,而不必过问意图透明。因为能力“是国家安全和独立的基础”,并且是可以进行衡量的,只有能力才能保证国家实现其特定目标并实施有效的行为。而意图常常具有不确定性和充满变数,例如某国确立了某一政策目标,但由于自身能力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它也许会发生实际的改变。所以,国家间无法正确认知对方的意图,总是通过相互猜疑作出判断。这就削弱了意图透明的重要性。与现实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则强调意图透明的重要性,认为国家意图对理解其行为模式和偏好是有意义的。基欧汉认为,一国对他国追求利益的行为之所以敏感,从根本上来说是受了那些国家意图的影响和驱动。无论国家是重视军事力量还是重视国际制度,只有通过意图透明才能辨别它们的选择偏好,并且只有在具有意图透明时,能力才能真正发挥作用。^① 确实,能力透明和意图透明的关系是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争论的一个焦点。尽管如此,双方都同意信息沟通困难使国家间无法获得有效预期,这是在军事透明度方面难以取得一致的重要原因。因此,只有在克服信息沟通障碍并由此促成有效预期的前提下,军事透明度问题才能被纳入解决的范畴。

由于在军事透明度问题上达成更深程度的理解与合作取决于信息沟通的畅通和有效预期的增加,所以它们也可以帮助正确理解能力透明与意图透明的关系。一般而言,如果当事国之间在能力和意图两个方面都对对方透明,那当然是实现相互间军事合作的理想状态,但在现实中这种情况很难出现。正因为如此,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存在着相当对

立的看法。应该说,能力透明和意图透明都是重要的,它们均取决于信息沟通和有效预期的程度。在缺乏信息沟通和有效预期的情况下,片面强调一个方面,特别是片面强调能力透明的重要性,有可能忽视国家行为的复杂性。第一,就一般情形而言,在两个国家之间,如果一方对另一方并不展现能力透明,那么在无法沟通从而导致有效预期不足的情况下,后者有可能对前者的意图产生误解,从而诱发彼此间冲突。但意图透明在很多时候也是重要的,因为它有可能与信息沟通和有效预期发生更直接的联系。这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得到证明。从正面来说,由于一国是否对他国构成威胁不仅在于能力,还在于动机和意图,所以与能力透明一样,意图透明也是国家间互动的重要条件。如在朝核问题上,正因为美国和朝鲜的战略意图明显迥异,才使这一危机举世瞩目。如果把朝鲜换成英国或以色列,也许问题根本就不会那么严重。因此,在某种特定时候,意图透明(包括不同意图和相同意图)由于关乎着信息沟通和有效预期的程度而显得甚至比能力透明还重要。从反面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意图变来变去,无助于国家间进行沟通和形成有效预期,其结果只会增加他国的猜疑,使之可能作出针对性的对抗反应。这些说明,能力透明和意图透明谁更重要取决于二者与信息沟通和有效预期的关联程度,而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情况。由于国家间对信息沟通和有效预期的需求是相当强的,所以只有满足这种需求才能进而合理地对待能力透明和意图透明的关系。

第二,即使在能力透明方面,实际上还存在着衡量标准的问题,因为使用不同的标准衡量确实可能得出相距甚远的结论。例如,如果以购买力平价公式来计算中国的GDP和国防费用,那么就不免存在臆想成分。《透明度》一文就据此认为,中国的GDP已经位列世界第二,军费预算在数量上仅次于美国,并且在占GDP的比重上超过了美国。^② 而如果以贸

^①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② “CA World Factbook”, <http://www.cia.gov/publications/factbook/index.html> 转引自马伟宁:“中美军事关系中的透明度问题”,《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0期,第61页。

易汇率来计算,中国的GDP仍然落后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国防费用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英国、日本和法国等国家;在占GDP和国家财政的比重上,中国不仅落后于上述国家(除日本),还落后于俄罗斯。^①应该说,在上述两种方法中,使用哪一种来衡量能力透明可能隐含着不同的“意图”,只有以信息沟通和有效预期的程度来衡量才可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理由很简单,能力透明(实际上也可以包括意图透明)仅仅是单方面的行为或者仅仅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方面要求,而提高信息沟通和有效预期的程度则需要双方或多方的共同努力。

归结起来,信息沟通困难和有效预期的缺乏是军事透明度问题趋于复杂化的深层原因。军事透明度的高低及能力透明和意图透明谁更重要,包括它们的判别标准,取决于国家对自身战略目标以及博弈的零和或非零和关系的预期程度,也取决于国家间沟通的过程和效果。只是由于信息沟通和有效预期经常出现失败的情形,所以问题的解决才总是在“刺激—反应”的困境中循环。而以新安全观来考虑,建立新安全制度是摆脱这一困境的重要保证。这主要在于新安全制度以共享利益(双赢和共赢)为出发点,以非零和博弈为互动行为的原则。而且,事实上它恰恰可以起到消除信息沟通障碍、增加有效预期、减少行为成本和提供谈判场所等作用。如果这些作用能够很好地发挥,那种因盲目进行军备竞赛而导致的隐瞒行为就会受到很大程度的遏制,不仅军事透明度问题会因获得稳定的沟通渠道和制度化保障而得到解决,而且能力透明和意图透明的关系也会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取得协调。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军事透明度的高低及能力透明和意图透明的重要性,都可以以共同遵守的制度和标准来衡量。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但在国际事务中也不断展现着开放姿态,目的就是希望以此来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和增加有效预期。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公开申明自己的和平外交取向,把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参加大量国际制度,接受和遵守现有国际规则;提倡新安全观,愿意加强在安全领域与世界各国的合作。近年来,中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进一步采取了建设

性做法。通过公布自己的国防政策,特别是自1995年发表有关军备控制与裁军的白皮书和1998年发表第一份国防白皮书以来,中国朝着加强国家间相互沟通和增加有效预期的方向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以中国对国家间沟通和有效预期的积极态度看,它既重视意图透明也重视能力透明,因为它把二者都视为加强信息沟通和有效预期的重要手段。因此,并不能简单地只说它只注重前者而不注重后者。这从中国近年来所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每一份国防白皮书都既详细阐明了中国的战略意图,又详细地说明了自己的国防能力。首先,中国国防政策的意图透明度很高,并且与整个国家的战略意图高度一致。由于中国的核心目标是实现现代化,所以白皮书所阐明的国防政策符合逻辑地是“为现代化建设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同时,与整体外交政策的和平取向相配合,国防政策带有明显的“防御性”特征。^②此外,国防政策以新安全观为指导,而新安全观主张通过对话建立相互信任,通过合作达成共同安全。所有这些情况,都意味着中国的战略意图与其他国家相比是相当透明的。而且,中国显然认为,意图透明可以增加相互信任,减少误判,从而使军事合作变得可能,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意图透明。所谓“言而有信”和“言必信,行必果”的东方式外交格言,似乎给中国对意图透明的重视和开诚布公的做法做了很好的注脚。

其次,中国也相当重视能力透明。尽管美国国防部2005年的《中国军力报告》称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军费支出国^③,但实际上中国2004年的国防开支仅约合255.79亿美元,远低于美国的国防开支

^① 以2003年和2004年为例,美国国防开支分别为4049.2亿美元和4605.47亿美元,英国分别为621.64亿美元和647.87亿美元,日本分别为405.98亿美元和415.51亿美元,法国分别为303.52亿美元和351.35亿美元,俄罗斯分别为109.89亿美元和137.17亿美元。中国则为230.5亿美元和255.78亿美元。以2003年度为例,美国国防开支占GDP和财政支出的比例是3.60%和16.20%,英国是3.11%和8.10%,俄罗斯是2.64%和14.69%,法国是2.22%和11.00%,日本是0.99%和6.06%。中国则仅为1.63%和7.74%。上述数据来源于该年度相关国家的国防报告、财务报告或其他政府文告。

^②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002年的国防》和《2004年的国防》。

^③ 美国国防部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报告》。

(美国国防开支是中国的 17.8 倍,人均国防开支更高达中国的 77 倍)。在中美军事实力相去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当然希望共同提高军事透明度尤其是能力透明度。而实际上人们看到,中国的每一份国防白皮书都详细地说明了自己的国防能力,在透明度上也是相当高的。以《2004 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为例,它在内容上包括安全形势、国防政策、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国防经费和国防资产、兵役制度、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国防科技工业、军队与人民、国际安全合作以及军控、裁军与防扩散等 10 个部分,全面介绍了中国的国防政策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不仅公布了国防费用的具体数字,而且公布了国防费用与 GDP 和国家财政的比例;不仅公布了国防费用的主要用途,而且公布了国防费用的管理措施;不仅说明了国防力量的基本职能,而且说明了国防力量的构成(包括二炮部队)。同时,它还与其他国家(主要大国)进行了相应的量化比较,包括国防开支的数字和各自在 GDP 和国家财政中所占的比重。最近,中国还把有关“神六”的重要数据传送给了美国,并允许美国国防部长访问二炮司令部。中国这种实事求是和负责任的做法,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对中国军事能力比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使它们对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包括“军事能力透明”所出现的显著进展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同样重视意图透明和能力透明,很难说它只重视或忽视哪一个方面,也很难说它以某一个方面掩盖另一个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具有相当开放程度的社会,国内民众也存在着了解和知悉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需求,由于中国加快了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把自己的发展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公开发表白皮书完全是基于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不仅对中国民众,而且对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种更加开放的做法。对此,即使是美国有关学者或媒体也有所体认,并作出了相应的肯定。例如,马伟宁在《透明度》一文中就承认,从中国近来公布的几册国防白皮书可以看出,中国的军事透明度正在发展,不仅有意图上的透明,而且也有能力上的透明。^①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麦艾文(Evan Medeiros)也指出,中国公布

的国防白皮书表明中国安全观念正在变化,对国际安全环境的看法持有积极态度,其中所显示的军事透明度有所增加。^②因此,美国有些人关于中国不重视军事透明度,特别是不重视能力透明,其能力增长必然引起意图变化并对世界构成威胁的论调,是一种相当片面、机械和不符合实际的想法。应该承认,由于与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中国也处在一个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因此可以说中国在意图透明和能力透明方面的平衡水平上已经达到了它所能做到的高点。此外,所谓意图透明和能力透明都受制于经济、政治和技术条件。要想达到更高的透明度,取决于这些条件的进一步改善,也取决于目前国际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在这方面,中美两个大国都负有重大的责任。

三

本文从理论和现实角度集中讨论了军事透明度问题,实际上包含着三个层次:虽然并不完全否定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的描述,但认为它在解释军事透明度问题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而需要树立新安全观,以利益共融(双赢和共赢)和共同安全的新观念看待军事透明度问题;以新安全制度推动安全困境的缓解,为军事透明度问题的解决创造最基本条件;加强信息沟通和增加有效预期,以正确理解军事透明度问题,包括能力透明和意图透明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军事透明度问题涉及到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而不同的理论背景会使中美以不同的态度对待军事透明度问题,并可能使它们在现实中选择不同的政策,所以文章较多地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其目的是为了双方在新安全观上凝聚更多共识,以增进彼此的信任。

当然,就现实层面来说,中国高度重视与美国的关系,因为它相信,中美关系包括军事关系的良性发展,对于促使安全困境缓解和世界安全形势的稳定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虽然双方之间确实有一些矛

^① 马伟宁:“中美军事关系中的透明度问题”,《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0期第61页。

^② Washington Observer No 14 2002

盾,但在国际反恐、防止核扩散、解决地区问题以及经济问题等方面,彼此存在着大量合作议题。事实上,双方已经在这些方面开始了合作进程。与此同时,中国充分认识到军事透明度问题在中美关系包括军事关系中所占的分量,中国的对美军事交流政策表明,它在军事透明度方面采取的是一种建设性的合作态度,不仅在提高自身军事透明度方面做出了切实的努力,而且希望通过进一步扩大对美军事交流,消除彼此在军事透明度方面的分歧。例如,自2001年9月中美军事关系开始恢复以来,中国对双方的军事交流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做法,既在战略安全、反恐、多边军控和防扩散等领域与美国保持着对话和磋商的良好势头,又在双边军事合作领域推动诸如两军高层互访、院校交流、机制性交往和军舰访问等项目的进行。这说明,中国对同美国的军事交流抱着十分认真的态度,把它视为中美关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并希望通过双方共同努力,不断加深在军事透明度问题上的相互理解与合作。

总之,持续开展而且程度不断深化的军事交流对中国和美国来说都是有益无害的,它是在军事透明度问题上加强双方信息沟通和凝聚有效预期的重要手段。它可以使双方以双行道而不是单行道的规则对待这个问题,也可以使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获得双赢。正如《透明度》一文所说,符合预期的是,与中国军队的交流对美国国家安全是有利的,一个更好的和更专业化的解放军并不等于更危险的中国。因此,本文虽不同意《透明度》一文的现实主义逻辑起点,但同意它最后的结论,即通过建立互信和展现透明,“可以使不同利益的两个国家之间避免冲突,和平地解决矛盾”。^① ○ (责任编辑:张浩)

^① 马伟宁:“中美军事关系中的透明度问题”,《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0期第62页。

(接第39页)表,充分表达了俄意愿,也是俄借上海合作组织反击美对该地区渗透、巩固俄在独联体地位的重要举措。

第五,尽力维持独联体旗帜不倒,使之成为保持俄影响力的长久工具。2005年6月“俄民意调查中心”在俄、白、哈、乌(克兰)四国进行的一项民调表明,只有11%的民众看好独联体,而四国中同意建立“欧亚统一经济空间”的比例分别为15%、30%、27%和24%。^①显然,不论是俄还是独联体其他国家民众对独联体的评价都不高,独联体作为一个组织机构未来将更松散,其影响力和行动能力会越来越小。2005年5月的独联体元首会议后,普京总统也悲观地指出,“独联体并未形成一体化的机制,它的作用只是一个讨论现实问题的俱乐部”^②。尽管如此,现阶段俄还是希望尽力留住独联体这个“俱乐部”。在8月召开的独联体峰会上,俄试图通过改革整合独联体,但由于成员国难以达成一致没能实现。会上土库曼斯坦正式宣布退出独联体,使独联体的前景更加黯淡。在此情况下,俄罗斯仍没有主动宣布退出或解散独联体,而是建议成立类似联合国改革“名人小组”的新机构,制订出与现实相适应又能继续维持其存在甚至发展的选择方案。目前

俄罗斯之所以对独联体不言放弃,是因为它不愿意放弃该组织所代表的地区,即使独联体未来变成一个纯粹的清谈俱乐部或论坛,只要这个组织存在,各国元首们能相聚并讨论一些问题,俄就可以借助它施加自己的影响,并借此在国际上显示俄对该地区事务的主导性,换言之,俄认为独联体尚有被利用的“剩余价值”。

独联体从成立至今已近14年,它完成了保障苏联解体后各国“和平离婚”和维护地区稳定的使命。现在,随着成员国自主意识的进一步增强,美国和西方势力的直接介入,独联体组织日益涣散,俄罗斯的核心地位正在受到挑战。由独联体这一“孵化器”孵出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与“古阿姆联盟”及其背后的支持力量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之间的明争暗斗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谁会在这场角力中成为赢家,各方能否最终走向共赢,还需我们密切观察。○

(责任编辑:黄丽梅)

^① Россияне не хотят жить в “общем доме” 20.06.2005 // ИА “Новости”. <http://www.suara.ru/sjrfes/04/01/06/3461/251281.html>

^② Цы вно А.Идли в рюзь, а бить вм есте. <http://www.eurasia.ru/article/PhP?id=140>